

技术 合作 专业化*

——蒙特雷国际翻译论坛对中国翻译教学的启示

肖维青 上海外国语大学/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

摘要: 作者从一名中国翻译教师的视角, 简要介绍2011年蒙特雷国际翻译论坛的主旨和精神, 探讨蒙特雷论坛对全球口笔译、本地化教育发展的推动作用, 特别是发掘蒙特雷论坛对我国翻译教育的启示和意义。在新形势下, 我国的翻译教育工作者在翻译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评估手段等方面, 应遵循翻译能力的构成和习得模式, 按照合作建构的教学观念, 倚重现代化的技术手段, 向着科学化、职业化的方向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业型的人才。

关键词: 口笔译本地化教育; 技术; 合作; 专业化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73X (2011) 04-0042-05

一、蒙特雷论坛概况

2011年4月7-9日第三届蒙特雷国际翻译论坛在美国加州滨海小城蒙特雷如期召开。蒙特雷论坛由世界知名的口笔译本地化培训学校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于2007年创办, 两年一次, 至今已举办三届。本次论坛共收到有效提交论文摘要60多篇, 来自美、中、加、英、法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160余名翻译界专家、学者、翻译教师、学生、业界人士参加了本次论坛, 是三届论坛中提交论文最多、参会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就论坛议题的前瞻性、分论坛安排的合理性、发言与讨论的深度, 本次会议具有高品质的学术质量和求真务实的学术规范, 代表了全球翻译教育的前沿发展趋势, 堪称当代口笔译本地化教育领域的一次学术盛会。

第一届蒙特雷论坛以口笔译教学方法为题, 第二届是关于口笔译教学评估, 本届论坛的议题是“口笔译、本地化教育中的创新”。围绕这个主题, 论坛共分4场大会主题演讲和8场专题分论坛。

笔者作为中美富布赖特研究学者, 从2010年秋季开始在蒙特雷国际研究院高级翻译学院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教学研究, 正好赶上了本届论坛的召开。作为全程参加的论坛代表, 笔者拟从一个中国翻译教师的视角, 简要介绍蒙特雷论坛的主旨和精神, 探讨蒙特雷论坛对全球翻译教育发展

的推动作用, 特别是发掘蒙特雷论坛对我国翻译教育的启示和意义。从大会发言主题、分论坛议题、与会者的兴趣点与讨论的焦点来看, 这次蒙特雷论坛的精髓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关键词: 技术、合作以及专业化。

二、翻译教育中的技术创新

近年来, 随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 包括计算语言学、信息论和人工智能等多种学科的飞速发展, 加上语言服务日益剧增的需求, 催生了一场翻译技术的革命。各种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应运而生, 带来了翻译生产力的巨大变革。各种专门领域的在线词典、机器翻译软件、翻译记忆和术语管理工具、语料搜索工具等如雨后春笋, 层出不穷。加上翻译流程的优化, 翻译效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过去的手工作坊翻译流程已经不再能适应当今大批量团队协作的业务流程, 如今大型项目的完整流程包括编译、工程处理、本地化翻译、软件测试、桌面排版和项目管理等一系列步骤(俞敬松、王华树, 2010: 38)。科技已经彻底地改变了当前翻译行业的面貌。

本届蒙特雷论坛的主题是创新, 创新的一个源泉就是技术。那么, 什么是翻译教育中的技术创新呢? 所谓翻译教育中的技术创新, 有两层意思, 既指技术在翻译教学内容上的分量不断加大,

也指翻译教学的方式、媒介和环境中的技术的含量越来越大。在 28 篇大会和分论坛发言中,至少有 6 篇与翻译教学中的技术有关,包括世界作家协会 (International Writers' Group) 的联合创始人 Jost Zetzsche 的大会发言“论语言行业的翻译技术”(Translation Technology in the Interconnected Language Industry) 以及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翻译学院 (UO-STI) 的大会发言“学生舒适水平以及翻译技术的教学”(Student Comfort Level and the Teaching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ies)。Zetzsche 在发言中指出,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21 世纪初的十几年来里,翻译行业核心技术的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Zetzshce 戏称那 15 年是漫长的产前阵痛期。直到近 10 年,翻译技术才得以突飞猛进,发展之快令人目不暇接,给翻译从业人员和翻译教育工作者带来了极大的挑战。Zetzsche 的观点是以开发的心态拥抱技术,以积极的热情了解翻译行业的未来,在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做出明智的选择。他为当代翻译教育工作者明确了新的角色:第一,帮助学生了解翻译行业 (navigate the landscape),包括行业运作过程、标准的重要性、数据资源等;第二,教授实用的概念;第三,培养各类人才,包括数据经理、(翻译项目)团队领导人、为其他行业服务的语言咨询师、译后编审、机器翻译人才等。渥太华大学翻译学院的报告则完全从教学实证角度,论证了他们设计使用的 CERTT 平台对翻译专业学生的帮助和影响。鉴于部分学生(包括教师)对电脑技术,特别是翻译技术适应性差的状况,他们开发了一个翻译工具使用辅导的平台,即 CERTT (Collection of Electronic Resources in Translation Technologies),这个平台提供对 30 余种翻译工具的使用辅导。然后他们调查了 85 位学生的对翻译工具辅导平台的反应,包括清晰性、完整性和实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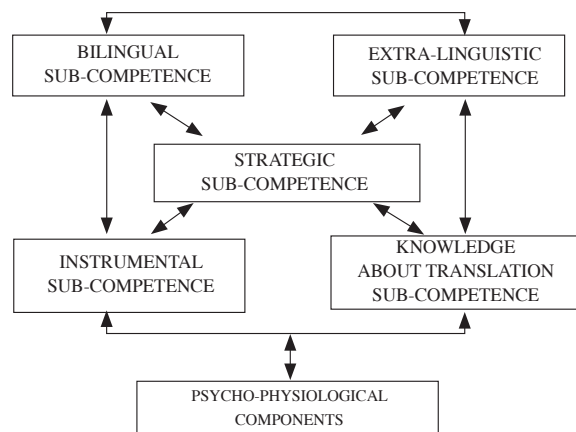
除了上述两篇,与会者还聆听了“云中的翻译——在翻译课堂中使用云计算服务”(Translating in the Cloud: Using Cloud-computing Services in the Classroom)、“自建学生口译语料库——方法论和应用”(Building DIY Corpora of Student Interpretations: Methodology and Applications)、“会议口译学生的远程质量评价”(Can Remote Assessment Be Effective for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Students?)和“译者的在线信息技能——教授专门笔译的横切视角”(Online Information Skills for Translators: A Transversal Approach to Teaching Specialized Translation)等有关翻译技术教学的发言。我们看到,技术在翻译教育中的强大渗透,不仅体现

在教学内容上,而且表现在教学方式上。令笔者尤为汗颜的是西方国家已经不再讨论翻译教育是否应该包含翻译技术的教学,而在讨论在课堂中如何高效地把技术和翻译融为一体。显然,这与他们普遍接受的翻译能力模式有直接的关系。

三、翻译能力构成模式与技术工具

根据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 PACTE (Process in the Acquisition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nd Evaluation)研究团队的科研成果,翻译能力既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技能或知识 (Bell, 1991),也不仅仅是一种交际能力、专家行为或主观条件 (Pym, 2003),而是译者进行翻译所必须的潜在的知识和技能体系(转引自马会娟、管兴忠, 2010: 39)。具体说,翻译能力应由下列五次能力构成 (2008 :106-107) :

第一,双语次能力 (bilingual subcompetence),即双语交流所需的程序性知识,由双语语用知识、社会语言学知识、语篇知识、语法和词汇知识组成。第二,超语言次能力 (extra-linguistic subcompetence),主要是陈述性知识,即关于世界的整体或具体知识,包括双文化知识、百科知识、话题知识。第三,翻译知识次能力 (knowledge about translation subcompetence),主要是陈述性知识,即有关翻译职业的各方面知识。例如,翻译单位的类型、翻译市场上的客户和受众、翻译协会、关税等等。第四,工具次能力 (instrumental subcompetence),主要是程序性知识,即在翻译中应用资料、信息和技术(如词典、百科全书、语法书、文体书、平行文本、电子语料库、搜索引擎等)的知识。第五,策略次能力 (strategic subcompetence),它是保证翻译过程顺利进行、有效解决翻译问题的程序性知识。策略次能力是最关键的次能力,因为它联系着其他各个次能力,并控制整个翻译过程。它的作用是规划、实施、评估翻译项目,激活并弥补各种次能力,确定翻



译问题并应用程序解决问题。

除了上述五个次能力外,翻译能力还包括心理生理要素 (psycho-physiological components)。整个翻译能力体系的构成见上页图,处于翻译能力核心的三大次能力,如策略次能力、双语次能力、工具次能力都是程序性知识。

PACTE 提出的翻译能力模型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的一个可视化模型,采取理论探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特别是面向职业译者的实证研究方法也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有关翻译能力习得建模与绩效评价方面的研究成果对翻译教学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 (李瑞林, 2011: 47)。国内对翻译能力的破解也基本是多元素论,一般都包含双语能力和策略能力,可是不论是姜秋霞、权晓辉 (2002)、杨晓荣 (2002)、刘宓庆 (2003)、文军 (2004) 还是苗菊 (2007) 的模式,都没有提到翻译可以依靠工具而且职业翻译必须依靠技术工具,他们的翻译能力模式中基本还是文学翻译的模式。美国学者 Angelelli 指出,是否能熟练地使用翻译工具,是翻译新手和资深翻译之间的一大区别 (2009: 37)。现代职业翻译早就局限于对词典的使用,网络、电子参考资料、语料库、CAT 工具 (即 computer assisted translation, 包括翻译记忆、术语管理等)、桌面排版系统、本地化工具等都能够极大地提高翻译的质量和效率。一个合格的译者不仅要知道如何使用这些工具,而且要知道什么时候使用哪种工具。一个合格的译者要知道如何在网络上搜寻资料,同时也要知道什么资料可靠、什么资料不可靠。一个合格的译者不仅要知道如何使用翻译工具,而且要学会创建和维护自己的翻译工具库。

在国内,可能很多人还并不清楚译者的工具已然是翻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或者不少教师对翻译技术的使用或教授抱有排斥情绪,只把目光重点集中在提高语言能力上。现代翻译的实质表明了使用工具的能力必不可少,而翻译市场的人才流向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据 2009 年 7 月 15 日的《中国教育报》,按照教学目标和规划,翻译专业毕业生的流向基本有三个层次:核心层,即传统的人工翻译服务;边缘层,指以翻译服务为主体或目的,需要借助计算机技术来实现,包括软件和网页的本地化、计算机辅助翻译、机器翻译;相关层,指其他与翻译相关,以研发、生产或销售其他产品为主导的一系列活动,包括翻译培训、图书翻译、影视作品翻译、翻译软件或翻译机器的研发、生产或销售,多语言语音技术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或销售等。如今,传统的以人为主体的口笔译和手语翻译产业核心层,将向产业边缘层和相关层加速发展,对相关层、边

缘层毕业生的需求也将与日俱增。而我们不难发现,所谓边缘层和相关层的岗位,基本都是围绕翻译技术而来的。为了不断帮助学生扩展视野,提高实际翻译能力,增加就业选择面,使其成为宽口径、复合型的人才,各高校的翻译专业课程中显然应该开设与翻译技术相关的课程,或者至少应该在翻译课程的内容和操作中加入技术的成分,比如让学生尝试较为简单的 Google translator toolkit, (有条件的还可以尝试 CAT 的知名品牌 Trados、Wordfast、Across、Lingotech、Snowball 等的有关产品) 并建议用 google docs 或者 typewith 等界面,合作完成翻译项目。

四、翻译教育中的合作因素

翻译教育中的合作其实也有两层意思,一是翻译课堂中的合作,既包括实际课堂,也包括虚拟课堂,既包括师生合作,也包括学生合作。这体现了教学法中的合作建构主义理念。在翻译教学中提到合作建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学者 Don Kiraly,他在专著《译者教育的社会建构方法》(A Social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o Translator Education: Empowerment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2000) 和论文“从教学到合作建构——是转瞬即逝的时尚还是译者教育转向的前兆”(From instruction to collaborative construction: a passing fad or the promise of a paradigm shift in translator education, 2003) 中提出:翻译教学不是传播式的 (transmissionist), 而是合作建构式的。具体来说,学生翻译能力的习得并非由教师教授和灌输而来,而是学生在和老师同学的共同合作的过程中,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建构而来的。学生翻译能力的习得有两个来源:一是在和同学老师的合作过程中,逐步了解翻译的性质、特点、规范和标准等,并且在翻译过程中不断加深认识;二是在翻译练习的过程中不断反思,重新认识自我,包括长处和短处,然后在实践中持续练习,发挥优势,补足缺陷,逐步实现从翻译生手到翻译能手的转变 (吴文安, 2010: 45-46)。在科技并不发达的时代,合作建构主义的翻译教学并非不可能,而在今天科技工具的辅助之下,翻译课堂中的合作则变得越来越便捷,也越来越受到师生的普遍欢迎。比如,加拿大约克大学的教师发现,给学生布置的团队项目实训时,学生们比较愿意使用 google docs 来完成。这个界面有助于学生共同完成一项翻译任务,包括草稿、修改、审阅、定稿等一系列流程,而他们不必安排大家都有空的时间面对面商谈,也不必再用电邮把文档发来发去,而担心格式的混乱。再如,著名的在线社交网络 Facebook 也被加拿大渥太

华大学的教师引入本科生的翻译教学。Facebook 的虚拟空间帮助学生在课外学习分享合作, 增加参与的力度, 而且也有利于教师跟踪学生的进展以及学生自我评价。当然, 网络学习环境并不局限于上述的两个例子, 且不一定非要照搬, 技术驱动的翻译教学可以以各种形式开展, 教学管理更科学, 教学组织丰富多彩, 完成同样教学任务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更少, 整个翻译流程更优化; 同时师生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也更加密切、频繁和有序。

翻译教育中的合作, 其第二层意思是产学研合作, 特别是强化教学与行业的联系。教学单位在教学规划制定、课程设置、教师队伍建设、实习实践基地建设、论文评价等方面要加强与行业和合作, 积极引导他们参与到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中来, 突出翻译教育的实践性(唐继卫, 2010: 52)。本次蒙特雷翻译论坛上, 我们看到一些用人单位和国家级的翻译管理机构的面孔, 包括世界知名的本地化旗舰公司莱博智(Lionbridge)和美国国家医疗口译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n Interpreting in Health Care)。

五、翻译教育的专门化

翻译行业的分工越来越细, 对翻译教育的投射作用很大。在本次论坛上, 笔者发现: 第一, 本地化成为了翻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 口译以及本地化的专门类别得到了充分重视。

在前两次论坛上, 不论是研讨教学方法, 还是教学评估, 前提都是在口笔译教育(translator/interpreter education)的大语境下, 而本地化还没有进入研究的视野。如今本地化成为这次论坛上当仁不让的亮点, 原因之一是论坛的标题是“口笔译、本地化教育中的创新”, 本地化概念的加入无异于一次正式的告白: 本地化成为了翻译教育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所谓本地化, 就是“对客户提供的产品或服务项目的语言材料、程序、包装方案、用户界面等在另一种不同的语言文化环境下进行翻译和改编设计, 以适应特定国家和地域的市场需求的过程”(苗菊、朱琳, 2008:30)。它就是为客户的产品或服务提供语言文字和技术服务的新兴行业, 在某种程度上, 本地化已经包括了笔译。在美国, 一般稍大型的翻译公司现在都改称为本地化公司(Localization Company), 业务范围的扩大也已成为趋势。然而本地化在我国翻译教育界仍然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 认识不清晰, 实践更落后。据我国本地化专家曾立人教授称, 国内讨论翻译本地化问题的论文数量不超过10篇, 具有学术分量的仅有苗菊、朱琳(2008)以及王传英、崔启亮(2010)

发表在《中国翻译》上的两篇论文; 迄今为止全国还没有本地化专业, 而开设本地化课程的院校目前也只有北大计算机辅助翻译专业。据LISA(本地化行业标准协会)统计, 仅语言翻译本地化一项, 全球就有200亿美元的需求, 而且全球信息本地化增速每年将超过15%(转引自苗菊、朱琳, 2008: 30)。面对巨大的而且不断增长的市场份额, 面对本地化给翻译行业带来的范式转变, 中国的翻译教育界应该看清形势, 学会接受新生事物, 更新教学理念, 在翻译专业课程设置中适当增加本地化课程或内容, 以适应职业化翻译人才培养的需要。以笔者所在的蒙特雷国际研究院为例, 该校开设了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项目管理和本地化培训课程(王传英、闫栗丽、张颖丽, 2011: 56), 设有两年制的TLM(翻译及本地化管理)硕士学位项目, 主要课程包括: 笔译、计算机辅助翻译、国际商务项目管理、营销管理、国际化知识、内容管理、翻译研究方法论以及商务方向选修课等。不少学生在修业期间到Cisco、HP、Oracle、Adobe等跨国公司实习, 参与本地化和翻译项目实践与管理。

我们可能知道, 笔译可以按照题材内容分成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 后者包括法律翻译、新闻翻译、科技翻译、经贸翻译等。而本次论坛上不少发言是针对口译、本地化教育中非常专门的类别, 比如口译方面有法庭口译、会议口译、社区口译(包括医学口译、电话口译等)的发言; 本地化有术语管理、项目管理、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等内容。仅以法庭口译为例, 本届论坛有两个相关的发言, 一是广外赵军峰教授的“模拟法庭辩论: 法庭口译员培训中的实用策略”(Mock Courtroom Debate: A Practical Scenario for Court Interpreter Training), 作者以广外MTI项目中的法庭口译教学实践出发, 强调法庭口译员的培训不能仅仅抓住语言和交际能力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要掌握法庭的实际诉讼过程。另一个法庭口译的发言人是蒙特雷国际研究院的Holly Mikkelsen教授, 她是美国法庭口译界的资深译员和学术权威。她在发言中主要讨论了法庭口译员在对抗制诉讼程序(adversarial legal proceedings)中进行证人证言交替传译时的主要障碍, 提出了法庭口译逐字翻译原则(verbatim requirement)下特殊的笔记策略, 例如, 如何判断是否需要做笔记, 如何将积极的听与笔记相结合, 如何处理话语轮次转换等。Mikkelsen教授的发言也涉及在课堂上讲授庭审规则(courtroom protocol)、法庭口译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以及语域选择(conservation of register)等问题。我国的法庭口译研究和教学, 起步都比较晚, 而近年来中国境内涉外法律争端

不断增加,以广州中级人民法院庭审公告的粗略统计,平均每周就有至少3起涉外官司的庭审(赵军峰,2011:24)。法庭口译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大,如何缩短从课堂到法庭的距离,国内学者和教育工作者还需改变教学理念,调整教学方法,更新教学内容。

诚如许钧教授所言,“如果我们不考虑市场的因素,还是以培养文学翻译为主,学生只懂文学,不懂其他行业、其他学科的专业知识,对其他领域的翻译特点不了解,没有足够的职业训练,那么他们怎么去应对市场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行业或教育一定要真正实现与专业挂钩。针对这种专业性,我认为我们的教育,特别是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一定要分类,比如工程类、医药类、法律类、经贸类、文学类等等。”(2010:53)专门化的翻译行业呼唤着具有特色的翻译教育,各个培养单位整齐划一地朝一个方向努力,是没有前途的。只有结合所在地区的经济社会形势,结合自己学校的教学优势,包括师资的专业知识结构和学生的功底水平,对具有优势的翻译专业有所侧重,比如开设法律翻译、医学文献翻译、联络陪同口译、翻译项目管理等分工比较明确的口笔译、本地化课程。总之,随着翻译产业的专业化、职业化和技能化的发展,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该转变教学理念,更新教学内容和方法,更加注重社会需求,加强案例教学,培养翻译的实干能力。

六、期待与展望

随着世界翻译产业的发展更趋专业化、职业化、技能化和市场化,中国的翻译教育界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翻译产业发展的同时,也要求我们翻译教育工作者在翻译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评估手段等方面,遵循翻译能力的构成和习得模式,按照合作建构的教学观念,倚重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向着科学化、职业化的方向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业型的人才。

本次论坛勾画出当前全球翻译教育的发展概貌,凸显了口笔译、本地化教育中的创新观念和实践支点,对我国的翻译教育有着深远的意义。当然,本次论坛也留下了很多思考的空间。比如:技术更新太快,在口笔译和本地化的课堂里如何应对?现代语言服务呈现出的学科交叉特点,对翻译教师提出了空前的挑战,一个以语言为背景的教师如何生存?在合作建构的思路下,师生合作、学生合作已经成为可能,如何促进翻译教师之间的合作和共享?专门化的培养是否会局限毕业生的就业面?这一系列涉及“技术”、“合作”和“专门化”的问题将有待各国同行一起摸索,

共同解决。

* 论文为作者主持的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本科翻译专业的测试研究”(09CYY005)的阶段性成果,亦得到上海外国语大学首届科研创新团队项目的支持。论文撰写过程中得到了蒙特雷国际翻译论坛主要策划人Takeda教授和叶子南教授以及本地化专家曾立人教授、法庭口译专家朱勇老师的指点和帮助,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 [1] Angelelli, C. (2009). Using a rubric to assess translation ability: defining the construct [A]. In C. Angelelli & H. Jacobson (Eds.), *Testing and assessment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2] Kiraly, D. (2000). A social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o translator education. Manchester: St. Jerome.
- [3] Kiraly, D. (2003). From instruction to collaborative construction: a passing fad or the promise of a paradigm shift in translator education [A]. In B. Baer & G. Koby (Eds.), *Beyond the Ivory Tower: Rethinking Translation Pedagogy* [C].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3: 3-27.
- [4] PACTE. (2008). First results of a translation competence experiment: 'knowledge of translation' and 'efficacy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 In J. Kearns (Ed.),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training: issues, methods and debates* [C]. London: Continuum.
- [5] 姜秋霞、权晓辉. 翻译能力与翻译行为关系的理论假设 [J]. 中国翻译, 2002 (6).
- [6] 李瑞林. 从翻译能力到译者素养: 翻译教学的目标转向 [J]. 中国翻译, 2011 (1).
- [7] 刘宓庆. 翻译教学: 实务与理论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3.
- [8] 马会娟、管兴忠. 发展学习者的汉译英能力——以北外本科笔译教学为例 [J]. 中国翻译, 2010 (5).
- [9] 苗菊、朱琳. 本地化与本地化翻译人才的培养 [J]. 中国翻译, 2008 (5).
- [10] 苗菊. 翻译能力研究——构建翻译教学模式的基础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7 (4).
- [11] 唐继卫. 加强翻译硕士教育工作 适应翻译产业发展需要 [J]. 中国翻译, 2010 (1).
- [12] 王传英、闫栗丽、张颖丽. 翻译项目管理与职业译员训练 [J]. 中国翻译, 2011 (1).
- [13] 吴文安. 学生自主选材翻译实践课可行性研究 [J]. 中国翻译, 2010 (5).
- [14] 许钧. 关于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几点思考 [J]. 中国翻译, 2010 (1).
- [15] 杨晓荣. 汉译英能力解析 [J]. 中国翻译, 2002 (6).
- [16] 俞敬松、王华树. 计算机辅助翻译硕士专业教学探讨 [J]. 中国翻译, 2010 (3).
- [17] 赵军峰. 作为机构守门人的法庭口译员角色研究 [J]. 中国翻译, 2011 (1).

[作者简介] 肖维青, 博士,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中美富布赖特研究学者。研究方向: 翻译教学、翻译批评。

[作者电子信箱] sophiexiao66@gmail.com